

德鲁克

管理经典

工业人的未来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

[美] 彼得·F·德鲁克 著

黄志强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德鲁克

管 理 经 典

工业人的未来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

[美] 彼得·F·德鲁克 著

黄志强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工业人的未来/(美)德鲁克(Drucker,P.F.)著;黄志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德鲁克管理经典)

书名原文: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

ISBN 7-208-04105-9

I. 工... II. ①德...②黄... III. 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发展—研究 IV. F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1635 号

责任编辑 王国平 曹培雷

封面装帧 吴骑飞 储平

美术编辑 甘晓培

· 德鲁克管理经典 ·

工业人的未来

[美]彼得·F·德鲁克 著

黄志强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375 插页 2 字数 148,000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4105-9/F·854

定价 15.00 元



作者介绍

“你想做的是什么事？”是当今管理学上耳熟能详的德鲁克式的问句。

被尊称为“管理学之父”的彼得·F·德鲁克(Peter F. Drucker)1909年出生于维也纳，在奥地利及英国完成教育。1929年起，担任报社的海外通讯记者。同时也为伦敦一家国际银行做经济评论工作。1939年起，到美国担任一家英国银行及保险集团企业的经济分析员，不久就成为美国几家大企业和跨国公司最知名的管理顾问。此后在纽约大学管理研究所教书二十余年。

德鲁克著述颇丰，其著作涉及工业社会的本质、企业管理的基础知识和技术变革等多个方面，见解独到而精辟，每一部著作都为管理学树立了里程碑，同时也奠定了他“当代世界最不朽的管理思想大师”的地位。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

Copyright:1947,1995 By Peter F. Druck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RANSACTION PUBLISHER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Inc.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2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转载。

出版说明

彼得·F·德鲁克是当代世界最著名的企业管理顾问，由于他在管理学上的伟大成就，被尊称为“管理学之父”。德鲁克也是杰出的教育家和著作家，著述颇丰，他的著作给现代商业公司提供了许多理论和实用的基础，被推举为“当代最不朽的管理思想大师”。本丛书所推出的四本著作，都是德鲁克的代表作，其中《公司的概念》、《工业人的未来》、《新社会》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一出版便引起轰动，在60年代和90年代不断重版，是德鲁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工业社会进行分析和评判的系列专著；《创新与创业精神》作于20世纪90年代，是德鲁克对企业如何进行创新活动的精辟论述。书中所论述的企业管理组织理论和管理原则、实务及训练，对我国管理理论与实践，有许多借鉴和帮助。但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书中的有些见解过于偏颇，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

本书在思路清晰和形式完整两个方面都得归功于笔者的妻子。谨将此书奉献给她，让她亲眼看到，她在本书所倾注的心血和精力并没有白费。

再版导言

许多朋友和批评家都认为,《工业人的未来》是笔者所写的书中最好的一本。这无疑是本人最寄予厚望的一本书,也是本人惟一的一本公开阐述基本社会理论的书。事实上,本书试图阐述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社会理论。其一也许可称为“一般社会理论”,这一理论提出了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是功能性的,而且是合法性的这一要求。另一理论也许可称为“特殊的工业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将这些一般概念应用于工业社会这一特殊案例,而工业社会是在二十世纪出现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我当时给书加了一个副标题:“保守之路”;因为书中的两个关键性概念:身份和功能,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术语——这两个术语可追根溯源到埃德芒·伯克^[1]和詹姆士·麦迪逊^[2],而不是约翰·洛克^[3],更不是法国革命和卡尔·马克思。本书的第三个关键性概念——合法性,从根本上说也是一个保守的术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4]很可能会使用这一术语,如果这一术语当时已发明的话(该术语可追根溯源至1820年左右,此时他已逝世许久),而本杰明·迪斯累里^[5]是千真万确使用过这一术语的。这一术语承认权力乃是一种社会现实,但是主张权力应建立在受到高度约束以及可说明性、责任和共同构想的

基础之上。

尽管“保守”一词意义非常古老,本书却不是“新保守主义”的(这一术语当本书在1942年初版时尚不存在)。首先是本人从来就没有变成新保守主义者的需要,因为这个词所指的乃是曾经是左翼分子的人,而本人从来就不曾是左翼分子。我们现在所说的新保守主义,笔者当时在本书中称之为“重商主义”——不过我已说过,这一提法已经过时,并且其所产生的效果也适得其反——今天我把同样的话再说一遍。这是因为,新保守主义是否认,而不是肯定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这一现实的。新保守主义实际上是鼓吹经济因素就是一切的十九世纪曼彻斯特自由主义^[6]的别名,而这与真正的保守主义立场恰恰是不相容的。保守主义的立场总归是,而且必须是把社区置于首位的。它并不否认经济和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岂止是不否认。事实上,在那些保守的原教旨主义^[7]者和“现实政治”的真诚信奉者(如亨利·基辛格)中,我一直被怀疑为对经济和经济因素的兴趣过于浓厚,被怀疑为鼓吹只有自由市场才能产生经济效果和控制权力,被怀疑为鼓吹工商业的第一要旨是赚取资本费用,即要有可观的利润,被怀疑为断言没有经济基础的军事威力只是痴心妄想,等等,等等。不过把社会的任何方面——甚至是精神方面——都纳入到这上头来,却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所不取的。在埃德芒·伯克、罗伯特·沃普尔^[8](十八世纪任多届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本杰明·迪斯累里辈的眼里,同样在亚伯拉罕·林肯或乔治·华盛顿看来——社会乃是多方面的。巨大的挑战——霍雷斯·沃普尔^[9]称之为“永无休止的冒险”的政治手腕——就是要平衡这方方面面。然而

要做到这一点,社会就必须是一个功能性的社会。它必须赋予个人以身份和功能,而且其权力必须被认为是合法的。

斐迪南德·托尼斯^[10](1855—1936年)所著《社区与社会》(1888年出版)一书,是社会理论和社会问题研究方面最伟大的经典著作之一。托尼斯把社区与社会相提并论,聚焦前者是为了存在即身份,聚焦后者是为了行事即功能。在《工业人的未来》中,我提出,工业社会的基本制度必须是两方面的,即一个赋予身份的社区和一个行使功能的社会,而这个制度本身还需要能使其能够这样做的独特的制度。我当时尚未把这种制度叫做“组织”;这一术语当时无人使用,甚至无人知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久才被使用[也许首次被使用是在我下一本书《公司的概念》(1946年)中,该书也正由事务出版社再版发行]。我当时尚未看出——同样,当时谁也没有看出——这一工业社会后来会成为一个由种种组织构成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单一工业组织的社会——意识到这一点是在十年以后。千真万确,许多作家,尤其是经济学家,直到现在还仍然眼里只有政府和工商企业,而看不到其他各种组织,如大学、医院、工会、教会等等,看不到现代社会正是通过所有这些组织履行其社会功能并组织其社会工程的。而《工业人的未来》一书当时就看得很清楚,工业社会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在结构上已有不同,而且它所面临的挑战、它的价值观和机遇也已不同。

3—

当大多数人都认为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已行将就木之时——少数人则认为,即使在美国也有挺得过或挺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能,遑论欧洲——本书切切实实地看到了,工业社会的这些挑战预示着战后世界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成

就。《工业人的未来》并不是一本“乐观主义”的书,其主要章节写成于1940年夏天,当时并无多少值得乐观的东西,因为无线电收音机里天天都在高声播放着纳粹的节节胜利、法国的陷落和英军的敦刻尔克撤退之类的新闻。不过本书却重申了价值观、希望和责任义务——而这些都由战后时期的种种事件得到了辉煌的证实,也由二战中出现的一个“工业”国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证实,这个国家就是美国。

今天我们已经走出了工业时代。其实,我们甚至已超过了“后工业社会”。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我称之为“后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以此命名的一本书,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重版就绪时将也可面世)。这是一个“知识”社会,而不是一个“工业”社会。然而,它对身份和功能的需要、需求和探寻,却仍与五十年前就工业社会而言是同样迫切的——这些毕竟都属于一般的社会理论,而不是工业社会的特征。制度中用以实现这些需要的仍然是组织,尽管不仅是大约从1870年或1880年到1960年或1970年间在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即制造业)组织。我们所需的具体实施应用无疑也会不同,但原则却是相同的。

还有一点说明:本书的开始写作是在欧洲步入二次大战之后,而写作完成(尽管尚未出版)是在美国参战之前。那时我已非常清楚美国将会参战——尽管何时和以何种方式参战当时仍不得而知,也不可能知道。第一章“一场因工业社会而打的战争”因此也许能特别引起今天读者的兴趣。书中所说的种种事情当时尚属新奇,甚至被视作异端。那个时候,人人都忧心忡忡——这种忧心忡忡是不无道理的——如何才能挺得过那场战争,如何才能不被黑暗势力所击溃。当

然,我当时也同样是忧心忡忡的;在写作此书的那几个月里,有许许多多晚上我都难以入眠。然而本书——这样一本书在那时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却敢于发问:我们对战后的世界寄予何种希望?我们必须如何去做才不至于愧对那个世界?“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就得去不断地努力尝试,”我的一个好朋友在七十八岁高龄开始从事一项“新职业”时如是说。这句话也完全可用来作为本书的题词。

彼得·F·德鲁克

于加利福尼亚 克莱尔蒙特

译 注:

- [1] 埃德芒·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年),英国辉格党(自由党的前身)理论家,议会政治的拥护者,对北美殖民地实行自由和解政策的支持者,法国大革命的反反对者。
- [2] 詹姆士·麦迪逊(James Madison, 1751—1836年),美国第四任总统(任期1809—1817年),美国宪法主要起草人,1812年任英美战争中美方军总司令,晚年任弗吉尼亚大学校长。
- [3] 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年),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认为人类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主张君主立宪政体,著有《政府论》、《人类理解论》等。
- [4]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ar Hamilton, 1755—1804年),美国联邦党领袖,美独立战争时任华盛顿秘书,大陆会议代表,后任首任财政部长(任期1789—1795年),提出建立国家银行和加强中央政府等施政措施。
- [5] 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年),曾任英国首相(任期1868年,1870—1880年),保守党领袖,作家,著有小说和政论多种。

- [6] 曼彻斯特自由主义,或称“曼彻斯特学派”,十九世纪英国部分产业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派别,主张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主义。
- [7] 原教旨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基督教新教一些标榜“保守”的神学家为反对现代主义而形成的神学主张。
- [8] 罗伯特·沃普尔(Robert Walpole, 1676—1745 年),英国辉格党领袖,财政大臣(任期 1715—1717 年,1721—1742 年),英国第一任首相(1721—1742 年),任期内减少税收,鼓励对外贸易;因对西班牙战争指挥不力,于 1742 年被迫辞职。
- [9] 霍雷斯·沃普尔(Horace Walpole, 1717—1797 年),罗伯特·沃普尔之子,作家,著述甚丰,以哥特式小说《奥特钥托堡》和大量叙述政治状况和社会风情的书信而闻名一时。
- [10] 斐迪南德·托尼斯(Ferdinand Toennies, 1855—1936 年),德国社会学家,其《社区与社会》一书 1888 年在德国出版。

目 录

再版导言	1
第一章 一场因工业社会而打的战争	1
第二章 何为功能社会?	17
第三章 十九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	33
第四章 二十世纪的工业现实	58
第五章 希特勒主义的挑战与失败	98
第六章 自由社会与自由政府	111
第七章 从卢梭到希特勒	142
第八章 1776 年保守派的反革命	160
第九章 保守之路	198

第一章 一场因工业社会而打的战争

一

这场战争是因为工业社会的结构而打的——工业社会的基本原则、工业社会的目的,以及工业社会的制度。这场战争是为了一个问题,而且只为一个问题:一个全新的物质现实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这一物质现实乃是詹姆士·瓦特在差不多二百年前发明了蒸汽机后西方人为自己所创造的生存环境。

这场战争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战争这一事实,比什么都更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在这场战争中,工业已不是辅助力量,其本身已成为主要的战斗力量。跟在这场战争后面来临的和平,必定是一种工业和平——在那种和平里,工业不是仅仅处于和平时期社会组织的边缘,而是社会组织的中心。因为政治生活的法则是: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社会组织必定是以同一些原则为基础的,而且必定遵循相同的结构规律。有时也许是战争创造了,或者说至少是结晶出了新的社会,有时则是和平。这一孰先孰后的问题是最古老的——也是最徒劳无益的——政治哲学思考之一;讲求实际的政治家很可能会觉得这一问题纯属“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类

的思考。但是事实本身并无丝毫疑义：战争社会与和平社会本是一体的。今天的这个工业战争社会，必将导致明天的工业和平社会。

在上次的那场战争^[1]中，人们尚可将工业系统及其社会组织视为区区附庸。这不仅是因为那时候机关枪、飞机、坦克和汽车等的运用以及错误运用，都仅仅是作为传统格局的步战的辅助手段。就其基本社会单元而言，1914 年的那场战争反映的仍是一种封建社会的结构；就其步兵连队而言，里面既无功能分工，又无技术分工，简直可以上溯到骑着马的乡绅地主由其步行的佃户和农奴簇拥着去参加战争的那种时代，与那时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诚然，在其最后的阶段，上次那场战争也已变成了一场工业战争。1917 年和 1918 年那些大规模的重大战役，已经是工业战役。然而，上一次的和平却不是一种工业和平。两次战争之间，西方世界的社会组织并没有解决工业社会这一问题，甚至都没有去尝试解决。凡尔赛世界^[2]的土崩瓦解，可再恰当不过地归因于这一脱节。凡尔赛及其之后的年代——甚至 1929 年，在大多数国家里直至 1939 年——决意，尽管常常是无意识地，推迟和逃避解决工业制度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人们那时在不遗余力地试图恢复一个基本上是前工业时代的社会——1913 年的社会。从根本上来说，两次大战之间的世人——由于时间过近，因而连我们这些生活在其中的人都尚不能完全理解其本质——已明显地意识到了这种脱节。这一点从把坚持永久和平作为维系凡尔赛世界社会结构的惟一途径上就显现了出来。

说自由社会可能挺不过另一场战争——这一点在 1928

年或 1934 年很少有人怀疑——其实就是说我们原先所了解的那个自由社会不能为工业制度找到一个社会政治组织。就其仅有的一点含义而言,那就等于宣判了自由社会的死刑,最大的奇迹只不过是缓期执行而已。因为永久和平只属于耶稣再降人间的千年太平盛世,而不属于任何人间的社会。事实是,这一死刑判决几乎已临近执行。这并不是由于自由国家里绥靖姑息的感情有了任何逆转,这种感情的根子在于深信工业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使自由社会完蛋;而是由于希特勒的根本性错误,我们今天还能在为自由而战。

在下一次和平会议上,我们可能会再次试图建立永久性和平——尽管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已开始怀疑这种企图是否明智。不过,我们当然不能也不会去逃避解决工业制度的基本政治社会问题。战争这一现实——且不说战争以后时期的现实——将令你无法逃避。

今天,战争的工业机器已不受任何意志的支配,而且已成了一切都围绕着它建立的中心。步兵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了附属性的力量源。一架轰炸机的飞行员与其机组人员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或者一辆坦克的指挥长与其士兵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同一条装配线上的工头与其班组人员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是一模一样的。这种社会权力关系的基础,在技术和功能等级方面同指挥等级方面是一样多的。今天,每一支军队内部的社会难题,诸如维持不了旧式的纪律、旧式的提拔制度和不根据工业技术而论资排辈的旧式晋升制度等等,正是体现了旧的前工业社会的军队在组织和掌握这种新的工业社会现实时已力不从心这一事实。在今天的每一支军队里,旧的社会形式正在让位给新的社会形式——这一